

文化与带菌者

——“伤寒玛丽”与社会控制科学

普利西拉·瓦尔德

1907年，华盛顿特区生物学会的会员们被告知说，发现了第一例已知的“慢性伤寒病菌传播者”或曰健康带菌者。¹一个明显健康的人居然会传染疾病，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于1902年公布的这一理论已经在查证过程当中。但即使在医学群体中间，也是后来才知道美国陆军卫生部队的一位工程师在研究伤寒病，于是召他去调查长岛某幢房子里发生的伤寒病。他就是乔治·A. 索泼医生；他发现的那个“带菌者”名叫玛丽·玛尔伦，是一个爱尔兰移民，为渡假时住在长岛的一家人做厨娘，她

将成为恶名远扬的“伤寒玛丽”。

索泼对他的发现所作的早期叙述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知识调查与侦探叙事之间的亲和关系。这种疾病没有超出房子和庭院，他排除了传播疾病的所有其他可能性之后，开始怀疑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厨娘，于是四处查找玛丽·玛尔伦。他求得一家玛尔伦曾经找过的不很公开的职业介绍所的帮助，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她受雇做家务，伤寒流行病也一直跟着她。他的结论是，找到了可以证实健康的伤寒带菌者这一假说的“事实”。他接下来找到了玛丽·玛尔伦，与她接洽并通知说她所处的地位是一种“活的文化试管和慢性伤寒病菌的制造者”。²

玛丽·玛尔伦不愿意相信索泼的假说，不愿意让自己做证明伤寒杆菌的试验品，这使医疗和公共卫生群体非常扫兴。儿童卫生保健的先驱莎拉·约瑟芬·贝克受命以公共卫生官员的身份采集玛尔伦的血样和尿样，她说玛尔伦“完全是一个躁狂者”，惊愕的索泼也在报告中说他不能“指望她会合作澄清她那神秘的过去”；他解释道：“我希望我们或许会一起弄清楚这个病例的来龙去脉，为保护以后与她接触的人们而制定合适的计划。”³公共卫生官员们对倔犟的玛尔伦的回应是把她强行迁入一个传染病医院，命令提取和鉴定她的排泄物。巴克尔评论说：“完全是她自己的不良行为使她遭到了那样的下场。医院当局对她仁至义尽，但是她永远听不进道理。”

玛丽·玛尔伦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社会的以及医学的

难题。她进行了法律起诉，使她的磨难为公众所注意，甚至引起公众的极大同情，但是法庭宣布她对公众健康构成了威胁，命令她回到曼哈顿东海岸北兄岛上的里弗赛德医院。由于公共卫生部门的一次行政管理上的变化，她被放了出来，命令她放弃以前的职业，定期向公共卫生部门汇报。但是玛丽·玛尔伦被放出来不到两年，就取了一个化名，消失了。在索泼讲的这个复仇女神的故事里，这份倔犟任性毋庸置疑地证明了他当初的断言：她是非常恶毒的。他讲的这个关于玛丽·玛尔伦的故事支配了1915年报纸上关于重新发现她的报道，把她说成一大公害，用“伤寒玛丽”一词确保她遗臭万年。

健康带菌者的发现显著地改变了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政策的方向，也显示并促成了社会政策的变革。在这个发现的底部，是染上病原菌的一个健康人；在它的中心，生成一个探讨和利用这一事实且特征和特性清晰可辨的特殊故事，一个“带菌者叙事”。故事的中心是一种明处荼毒人口（整个人口或一个特殊地方的人口）、暗处威胁社会秩序的传染疾病。故事讲的是以科学家和公共官员为典型的专家们如何对这种疾病的扩散探根溯源，直至找到一个不认识的传染动因；而且这些专家把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来，直接引向并因此也证明了他们的特殊解决办法。这个故事非常典型地用科学的语言提出了社会的问题。它把理论表现为一种发现，读上去像一部侦探小说。

“伤寒玛丽”的故事代表了医学群体与媒体的携手合

作，媒体所支持的理论将成为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从玛丽·玛尔伦到“伤寒玛丽”的转换是带菌者叙事的美原型，也是这一叙事的最耸人听闻的显现。首先，她的故事表明她是伤寒病人的传播媒介（就是说，她能传播但不会染上这种疾病）；其次，她给群体带来了危险；最后，把她隔离开是正当的。无论结局如何，这类叙事确立了带菌者的存在，评估了他们对群体的威胁，相应地也证明了处置办法的正当性。把关于带菌者的描述理解为“叙事”，就是要关注把理论——在这里是细菌学研究的发现——塑造成文化常规的那些故事的可辨特征和共同的形式特性；技术概念和术语变成了生活体验的“真理”。

像玛丽·玛尔伦的这类故事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叙事是非常合拍的，显示出强调的重点已经微妙地转移到对个人观（personhood）和社会责任的理解，曾经主要被视为秉有自然权利的个体此时被看做对自己有意或无意的行动负有责任的社会存在。⁴ 这些叙事特别商讨了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换以及家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压力之下繁衍的性别角色。“伤寒玛丽”的原型故事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公共卫生政策，它实实在在地促成了一种叙事的阐发，把性别角色的转换与种族（白人）命运并因而与国家安危关联在一起，包含了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带菌者叙事唤来新的科学权威以证实危险，把民族的健康和福祉交托在乔治·索泼这样的社会工程师的手里。

在世纪之交写作的社会学家 E. A. 罗斯曾经用社会控制这一术语解释推动个人观的转移及其与政体健康的联系的前提。这一术语指“社会集团得以聚合的美德和良心”⁵所表现的外部影响。这个概念是早期社会学家旨在建立一门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和促进这种凝聚性的社会科学的努力之一部分。在罗斯的理论中，社会解释和准则代替了道德解释。例如，一种更科学的刑罚学对罪行的评价和惩罚主要不是依据个体犯罪行为的堕落，而是“主要根据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依这些标准，一种疏忽罪可能比一种激情罪招致更严厉的刑罚。罗斯解释说，比如法律“将严厉对待疏忽大意的列车调度员，因为在调度列车时绝对不能出错”。与最早的带菌者有关的公共卫生政策显示出这一原则的影响。正像“伤寒玛丽”的故事突出表明的那样，这一原则甚至延伸到对性别角色的管束，使之成为民族健康和福祉的一种表达。带菌者叙事产生于并且发展了社会控制意识形态。

当传染性用来促成带菌者叙事并证明社会控制措施的正当性时，模模糊糊的社会威胁就变得凿凿可鉴了，否则这种叙事就可能太极端了。据罗斯观察，带菌者叙事在需要社会控制的时候尤其盛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在1901年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部专著中解释了社会控制的兴衰与社会变革的幅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而社会变革产生于诸多因素，包括文化遭遇、政治动荡以及经济发展。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描述是，“强大的力量越来越转入社会

之中，也就是说，越来越用铆钉和螺丝联结起来的结构取代活组织”。罗斯指出，随着有机社会观念向机械社会观念的转移，人为的联结和支持越来越取代了自然的联结和支持。他发出了我们当代的民族理论家、尤其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先声，他说：“随着传播手段的提高，随着学校和报纸的强盛，随着人敢于从他那津津有味的日常任务中抬头观看，观照遥远的人们及其境遇的那份悠悠然的心境使得博大的友谊覆盖了有限的个人接触。”罗斯是在为他所理解的“民族的兴起”作证，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更彻底和全面的控制手段”。

这一时期的卫生手册用语把个体列入社会控制规划的项目之一，发动一场对付传染疾病扩散的运动。战斗的语言是这些讨论的特点，将疾病拟人化，对细菌提出控告（推而广之，对染病的个体提出控告）。一位在 1910 年出版了《卫生基础读本》的生物学教授曾经向他的年轻读者解释说：“细菌是人类的最大敌人……这些细菌与身体之间的战争永远不会停止。”⁹⁶作者以这种修辞使他的年轻读者的身体与疾病拉开距离。然而，把一种病痛归咎于传染的动因，这也表征着某种道德的失败。他总结说：“总之，大部分家庭之所以受细菌疾病的折磨，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小心，不是别人的过错。”

更大的问题是健康带菌者和其他人往往不知道这种对带菌者的描述，他们真的是疾病的体现者。关于带菌者的描述证明了医疗机构试图将身体已经成为感染场所的

个体予以概念化的努力。例如，在带菌者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的 1922 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的亨利·J. 尼科尔斯少校在为医务人员编写的带菌学（phorology 教材里，从存在的角度看待这场斗争，使战斗语言更上一筹。他解释说：“巴斯德和科赫的寄生物学”已经“与达尔文的宏大思想联结在一起了，已经在为存在而制定的斗争方案中占了一席之地……它昭示人类反对其寄生物的战斗可能会出现新的结果。完全可能是病人摧毁寄生物，恢复健康。也可能是寄生物赢得胜利，使病人死亡或残废。不过，也可能打个平手，产生出带菌者。”⁷⁷ 达尔文范式竖起了更高的界桩，妖魔化的语言更加激烈。尼科尔斯评论说：“我们为了人类的福祉而不可思议地信托和适应自然，但是不应该忘记伤寒胆囊或白喉扁桃体代表着将人类的真正敌人永久化的一种妖魔机制。建立预防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打破这种不利于人类的平衡。”尼科尔斯非常小心，把一种生病的器官而不是一个个体推为一种“妖魔”力量，在“人”与“其寄生物”文明与自然的边界上保持平衡。生病的器官成了偏常环境的范本，最终对文明本身构成了威胁。在尼科尔斯描述的这场战斗中，人的定义和永久存在都是最要紧的问题，为了更伟大的使人类永存的事业，医务人员和带菌者等必须随时准备把带菌者的器官分离出去。

对于尼科尔斯而言，带菌学既代表亦呼唤医学实践方式和理解个体的方式的变革。鉴于他所称的那种“过去

的极端个体主义”的困扰，他提出“医学的社会化”，催促医生们“跟上不断增长的对应用型实践措施的社会需求”，他在该书的结论里还引入一段给人印象很深的论战文字：

作为医生和公民的我们需要始终认识到，在某些方面，个体是最终的单位，然而在另一些方面，他只是家庭、社区和民族等更高单位的一部分。所以从医学乃至生物学角度看，种族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体的局部利益。另一方面，从长远观点看，从群体福祉中获益的正是个体。

尼科尔斯是以进步论的语言说话的，他清楚地把存在标识为一种社会和生理的状况。他在生病与健康的边界上盘桓，带菌者也成了其他边界上的焦点：疏松和渗漏的身体之间的边界，同样疏松和渗漏的社会单位之间的边界——阶级、邻居、城市乃至民族等社会单位。与此同时，带菌者是一个可以揭示医学科学的事实，是一个经验决定的威胁公众健康的生灵。带菌者的情况代表着科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的一种相互界定和转换，带菌者叙事商讨并标明这种转换。

健康带菌者这样一种边界人物很适合阐发世纪之交的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个人观方面发生的着重点的转移。例如，尼科尔斯提出，决定某人是否是带菌者的

试验应该成为常规医疗检查的一部分，他说：“如果我们……把个体看做一种社会的存在，那也就是表明要决定他是否是带菌者。”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如果我们明白个体是社会的存在，那么就必须承认他们是容易传染的；二，如果我们承认他们是社会的存在，那么就必须要求他们的个体权利服从更大的群体利益。不言而喻，“社会的存在”并非尼科尔斯发明的概念，但意味深长的是他感觉自己需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尤其是对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员讲话时，更要说出这一点。社会性是进步论的特点，尼科尔斯所称的“极端个体主义”是典型的早期细菌学的科学思维，他将二者相对照，让人们注意各种哲学思想之间的根本冲突和带菌者在这些冲突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当代的医学史家已经指出，细菌学的出现和广泛接受促进和改变了医学专业对疾病的理解和调治。19世纪卫生学家对社会和环境的突出关注是与认为秽物生成疾病的理论相一致的，由此产生了随着细菌说疾病理论而出现的个体主义的健康管理策略。⁸罗德岛州普罗威登斯的卫生监督员查尔斯·V. 查平在他的著作中反映了这一转换。查平是20世纪早期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位领导者，他在写于1910年的这部著作中呼吁立即修改“关于国家卫生功能的流行观念”和“俗人和外行报纸……”的一般信念，他们以为“大部分传染疾病的来源都在身体之外的秽物”或至少“把外部的传染源看得同等重要”。⁹查

平承认某些卫生运动如改进人类排泄物的处置和水的净化减少了某些疾病，卫生城市的做法提高了个人的卫生习惯，这无疑是传染病预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在总体上坚持认为：

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除了一二种疾病，除了一些非常间接的效果之外，清扫街道、小巷和院子，清扫人畜居处，整治有害的贸易，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防微杜渐，与总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关系，即使在预防特殊疾病方面，也没有任何价值。上述改善城市的事情是值得做的，但是这几乎不成为卫生官员们去做的理由，正如他们无需去安排自由转车和月票、降低煤价、减少衣服中的膻口、增加橡胶制品中的橡胶含量。

查平提倡在预防疾病时采取个体行动主义，通过合适的行为减少“接触传染病”，比如“不要把手指伸进嘴里，也不要把不属于那儿的任何东西放进去”。《卫生基础读本》和查平的《传染源和传染方式》出版于同一年，他就像《卫生基础读本》的作者一样，力倡个体责任和个人习惯是抵御病菌的最有力的武器，个体是医学关注的最重要的单位。

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显示出新的个体主义细菌科学的不同观点，演化出进步论的环境主义观点。例如，在查

平动笔写他的那些很有影响的主张时，莎拉·约瑟芬·贝克已经开始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设计和证明源于“在当时……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想法”的社会改革：“使人们不致死于疾病的方法是……让他们不要生病。健康的人不会死。”¹⁰ 贝克像许多卫生改革家一样，终其一生自觉地寻求个体主义的科学发现观与环境主义对社会改革的重视的结合，使之服务于她看做公共卫生之基础的预防医学。甚至在细菌学的最高层，科学家们也对德国医学研究者费迪南·胡埃普所称的“关于有病细胞和生病细菌的本体论思考”保持着警惕，这种观点往往把病菌视为疾病的惟一动因，忽视了滋生它们的环境。胡埃普猛烈鞭挞当时大部分医学研究表现出的泛灵论和迷信的思维特点，他发现甚至像罗伯特·科赫和路易·巴斯德那样饮誉四海的现代细菌学创立者，也犯了本体论谬误的过错，他称之为“纯粹神父医学的残余”，“在科学的生物学、病理学或卫生学观念中没有任何地位”。¹¹而他却坚持一种更为动态的（和环境主义的）疾病观念，把疾病理解为“一系列因子和不平等价值的行动所导致的过程”（275），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事件结成的链条，包括病菌和容易衍生病菌的环境。

医学史家朱迪思·瓦尔泽·利维特和 J. 安德鲁·门德尔松在他们最近的研究中把“伤寒玛丽”的个案推断为理解世纪之交细菌科学和社会改革不和谐前提的——因此也是公共卫生冲突的——关键点。在利维特看来，该

个案的歧义产生于公开对立的语言，细菌学新科学的语言把玛尔伦说成“实验室确定了的病人，因为她传播这种疾病”，此外还有个体权利和社会公正的语言。¹²利维特指出，把玛尔伦公开转换成“伤寒玛丽”，这表征着实验室的科学语言战胜了权利和公正语言；不过，她也看到了20世纪前期公共卫生政策发展中社会关怀对医学视角产生的最终的调和作用。门德尔松不同意利维特的观点，他认为这一时期对待伤寒病的政策“是人道的但并非社会的”，明确指出带菌者研究在侵蚀社会解释和社会因子中发挥了特别的作用，这些社会因子显然是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代替科学的病原学解释和公共卫生政策的阐发。¹³细菌学家及其支持者们把重点放在对带菌者的定位、记录和跟踪，而不是减轻滋生伤寒等疾病的条件。因此，他认为理论化了的带菌者状态典型地维护了科学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分割。

门德尔松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医疗和公共卫生官员在界定和对待带菌者状态时以科学性代替社会性的现象。他固然讨论了他们的详细主张，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替代的语境，细菌学家的科学焦点已经融入并重新阐发了得以理解个体的社会视角。即使门德尔松表明公共政策分割为科学性的（个体主义的）和社会性的（环境主义的），个体概念也已经被这两个视角的相互渗透和重新构形所改造。换言之，构成科学视角之焦点的个体已经通过社会责任和“社会控制”等用语和假说得到了阐发。而且，

《卫生基础读本》和查平以及尼科尔斯著作中所指的社会责任反映了个体主义与环境主义的融合。媒体与医学机构谋将玛丽·玛尔伦转换成“伤寒玛丽”，它们的语言和逻辑活生生地展现了一个个体向尼科尔斯所称的“一个社会的存在”的转换。当玛丽·玛尔伦拒绝迁就公共卫生官员和医务人员的权威时，当她不愿加入将自己的器官从自身分离出去并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科学的战斗时，她就对社会责任地位构成了威胁。作为“伤寒玛丽”，她象征着社会控制的前提、合理化和最终的胜利。科学家们把她指称为“伤寒玛丽”，以此收回了她的身体，重新确立了秩序。她的故事所标明和中介了的变化是，强调通过社会责任来构想个体权利。

关于带菌者状态的理论和故事组成了带菌者叙事，如果说它们旨在维护社会性与科学性的区别，那么它们也表明二者总是竭力结合在一起。尼科尔斯所用的“社会的存在”构成了对疾病和个人观的科学理解和社会理解。个体的存在派生于群体，这不仅是在社会的意义（有意义的存在）上而言的，而且也意味着群体的物质条件和社会互动关系会对个体产生生理的后果。

从许多方面看，玛丽·玛尔伦并不具有代表性。在刚发现她的时候，她的难题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利维特和门德尔松都指出，1901年作出的监禁她的决定并没有成为对待带菌者的法律先例。但是从当时到现在，“伤寒玛丽”一直是科学、社会学和新闻文字中的带菌者原型（正

如她的故事成了带菌者叙事的原型)。这个故事变得引人注目，明显地抓住并维持着公众的想像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所论疾病——伤寒的性质决定的。但是这种疾病所引起的忧虑由于渲染它的传染性的各种传说中包含着其他文化焦虑而愈益加剧。玛丽·玛尔伦的故事被转换成“伤寒玛丽”，突出地展示出在阐发这种形成性的带菌者叙事所反映的个人观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关于疾病和传染的医学语言曾经影响了对阐发中发生的变化焦虑并且被这种焦虑所影响。

一种民族病

在带菌者研究的早期文献中，主要是关于伤寒病的研究。索泼的发现是偶然发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早期对伤寒病的强调，但是之所以如此强调的原因也与这种疾病的性质有关，正如它与“伤寒玛丽”的故事有关。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普遍认为威胁最大的传染和感染疾病当中，只有伤寒是通过食物和水源污染而不是亲近接触来广泛传播的。因此，伤寒比其他疾病更需要把科学办法和社会办法结合起来。即使最率直无忌的“个体主义者”也承认市政改革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针对食物和水源的储存和分配的改革是为了控制伤寒。查平对他的读者说：“在普通的感染疾病中，伤寒发烧实际上是对于目前西欧和北美人民而言惟一重要的疾病，它往往是通过饮

用水的途径扩散的。”所以他认为“值得为预防它而大量开支”。¹⁴

伤寒病发作时特别标志着家庭和国家的耻辱，这可能是它的传播方式所使然。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宣称伤寒病是“民族的耻辱”，是一种“肮脏、穷困和举国漫不经心”的疾病。另一篇文章则宣布它是“一种有缺陷的文明的疾病”。¹⁵伤寒病标志着工业化的失败，社会责任和控制的失败，也是现代性的失败。在（美国和欧洲）发现玛丽·玛尔伦和其他带菌者之前，人们大都把伤寒病与被污染的流体（水源和牛奶）以及牡蛎之类的食物联系起来，这类食物是因为与那些流体接触而被污染的。最早怀疑的“带菌者”是普通的家蝇；随着细菌学的表述和广泛接受，家庭主妇们不断被吁请加入运动，对付一篇报告所称的这种“最简单的”健康问题和“最不能原谅的”疾病。在这篇题为《伤寒病：一种不必要的祸害》中，同时也是《肺结核：真正的种族自杀》一文作者的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对《麦克鲁尔》杂志的读者说：“所有的伤寒病都可以溯源到被污染的水那里。如果全世界在一年时间里不喝那种淡淡的污水，伤寒病就会从我们的生命统计中永远消失。”¹⁶伤寒病是由于摄入糟粕物质而导致的，这一时期的许多作者都喜欢这样解释：它是工业化国家无法重新吸收废弃物的结果。

在服务于社会控制时，伤寒病生动地勾画出现代国家的社会网络，标出了问题的焦点所在。伤寒病是许多传

染和感染疾病中的一种，关于它的发现是伴随着细菌学这一新生科学而来的，并且使它为国家服务，这使它的病原和感染性变得非常清楚。人们发现微生物可以引起伤寒、肺结核、炭疽、白喉以及产褥热等疾病，这不仅改变了对疾病和身体的理解，而且改变了对民族的理解。尤为突出的是，微生物的发现使科学家得以测绘和记录以前所有参与者都看不见的那种感染接触。如果有人患了伤寒，那就意味着他摄入了别人身体的排泄物。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发生的一种流行病可能溯源到洛威尔一个生病的磨房工人的排泄物，患有将索泼引向玛丽·玛尔伦的那种病痛的人们可能被断言摄入了厨娘身体的废弃物。

伤寒病使工业和移民城市里与陌生人的亲近接触和物质关系变得僵硬而了无生气。疾病的人传播媒介的发现导致了恐接触症，“种族自杀”之类的话语中轻易地把伤寒病列入其中，就说明了这一点。流行性伤寒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既打击富人也打击穷人的疾病，因此被方便地类比为白种人的灭绝，因为他们还要对付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竞争。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在身体上和经济上显然都处于四面被围的态势。再者，流行病也是全球商业增加之后产生的破坏性结果。例如，英国精神病医生哈夫洛克·埃里斯提出一项需要“强烈的民族感情和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的民族进步”的卫生改革纲领，他承认疾病像资本一样是没有边界的：“在我们继续走完漫长的改革道路之前，随时可能碰到从亚洲兽穴里跑出来的流行

病恶魔在西面的活动，带来死亡和苦难。”¹⁷

像伤寒病这样的疾病使美国沙文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沙文主义惊惶失措，因为它们向来以非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流行病来标榜西方的进步和优越性。例如，为《美国评论经典》写伤寒病的一位医学博士在其文章《向美国伤寒病开战》的开头，洋洋洒洒地描绘了一幅盲目乐观的美国人形象：

从去年好几个星期到今年冬天，亚洲霍乱光顾了欧洲人民，在俄国尤其如此。每天早晨，美国的读书人、领导人、杰出的务实家、还不包括像小鸟一样早早起来翱翔的自由人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人，这些美国公民们一边浏览报纸，一边为那些遭受着痛苦的不幸者感到悲悯，他们因为无知和懒散而不得不承受痛苦。美国公民像往常一样，在早餐的咖啡杯前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些盲目的、糊涂的和迷信的帝俄农民一样无可奈何地承受和死于霍乱。这样美滋滋地思索着的美国公民在他的某个下意识层上搁置了或不再考虑美国的伤寒病。¹⁸

渲染的文笔抓住了读者的那种假设的惬意和幻想的安全感。可以看出读者是在不连贯地阅读关于其他某个地方的报道，最后闯进来美国伤寒病，使美国的“我们”与俄国的“他们”的区别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人就像“外国人”一